

论新诗美学范式的重建——兼评《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

马兴艳^{1*}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新诗美学范式的建构不仅关乎新诗诗学体系的良性发展, 更是维系中国现代诗歌生态健康平衡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 学界对新诗的研究重心多置于“历史脉络梳理”与“经典文本确立”, 这种研究取向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新诗诗学的学术根基, 却也客观上造成了对新诗美学方面的审美性遮蔽。这种遮蔽不仅限制了新诗诗学研究向审美本质的掘进, 也制约着新诗发展的理论拓深。《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的出版, 标志着新诗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该书以系统性的美学范畴体系为理论切入点, 通过对郭沫若、冯至等经典诗人, 以及自由体诗、象征派、现代派等关键诗学流派的深度考察, 抽绎出“崇高美”“丑”“怪诞”等新颖的诗美范畴, 拓展了新诗美学研究的维度, 打破了学界以“史性叙事”为主导的认知范式, 为新诗美学范式的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型, 展现出极高的学术创新意义。

关键词: 《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 新诗美学范式; 诗学生态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New Poetry -- Commenting on "The Aesthetic Category of New Poetry and the Art of Poetry"

Ma Xingyan^{1*}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new poetr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poetic system of new poetry, but also the key to maintaining the healthy balance of the ec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For a long ti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new poetry has been mostly on "comb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stablishing classic texts", although this research orientation has consolidated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of new poetry poetic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also objectively caused the aesthetic obscuration of new poetry. This kind of obscuration not only restrict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esthetic essence of the poetics of new poetry, but also restricts the theoretical deepe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esthetic Category of New Poetry and the Art of Poetry mark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new poetry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esthetic category system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classic poets such as Guo Moruo and Feng Zhi, as well as key poetic genres such as free-form poetry, symbolism, and modernism, the book extracts novel poetic categories such as "sublime beauty", "ugliness" and "grotesque", expands the dimension of new poetry aesthetic research, breaks the cognitive paradigm dominated by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poetry aesthetic paradigm, showing extremely high academic innovation significance.

Keywords: "New Poetry Aesthetic Category and Poetic Art";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new poetry;

引言

中国现代新诗的生成与演进,始终伴随着诗学理论的同步跟进与体系构建。在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新诗先后经历了初期对“形式与内容”的理论论争、中期对格律、音节等形式规则的重构,以及后期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探索深化,在文体形态与精神表达层面均朝向多元自由的方向发展。尽管在形式革新与思想开掘上取得显著突破,但学界对新诗美学范式的系统性建构与诗美艺术的深度研究仍显不足。当前研究多将新诗简单纳入现代文学艺术范畴,常以叙事文体的研究路径切入,聚焦于思想精神与语言技法的分析,这类研究难以充分阐释新诗的独特性,尤其是潜藏在诗歌思想与语言背后的诗美旨趣。因此,新诗“诗美”范畴的理论建构,对完善新诗艺术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值得关注的是,程国君教授的专著《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恰是聚焦于新诗美学艺术的力作。该著作以“诗美”为核心主线,突破了诗歌创作中的技术壁垒、派别分野与性别局限,以全景式研究视野,细细挖掘新诗的美学内蕴,填补了新诗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

1. 新诗美学建构的问题与意义——程著的理论起点

五四运动以来,新诗创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思想内涵呈现出多元交织的复杂格局。在思想维度上,“既有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分野,又有革命诗歌、国防诗歌、自我表现的诗歌等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1],持续拓展着新诗的精神疆域;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相继涌入,形成多元共生的艺术格局;诗歌流派方面,“自由体诗派、新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各种流派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太阳社、中国诗歌会等各种社团”^[1]林立;形式上以白话诗为主体,衍生出自由体、民歌体、散文诗、新格律诗等多元文体形态。与创作实践的蓬勃态势相比,新诗理论建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初创期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形式与内容”的重构,这一取向源于双重历史语境:其一,旧体诗的格律体系已成为思想表达的桎梏。刘半农直指旧诗格律“束缚思想过甚”^[2],提出新诗创作的三原则:“一是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是增多诗体,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三是以方言填词,今话作曲”^[2]。康白情亦批判旧诗格律为“桎梏人性底陈套”^[3],学界更将其视为文学革命需破除的“骸骨”^[4]。这些批判既呼应着晚清“诗界革命”的变革逻辑,也凸显了新诗突破形式藩篱的内在诉求。胡适等留洋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学启发,认识到白话语言的民众亲和力,这一认知成为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其二,20世纪初的时代语境呼唤文学形式革新,对旧体诗的改造恰与知识分子的文学变革诉求相契合。不同于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的改良路径,民初知识分子在亲历西方现代文明后,更深刻认识到语言通俗化对文学启蒙的关键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直至1917年,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新诗仍未出现——即便被视为“白话新诗鼻祖”的胡适,其早期作品《沁园春·誓诗》仍残留旧体诗痕迹,尚未完全突破格律束缚。西方文学思潮的介入加速了新诗从“改良”到“革命”的质变。1914年胡适在《自杀篇》后记中提出“字句形式不为成法所拘”^[5]的创作理念,此前他刚以白话文翻译苏格兰诗人安妮·林萨德的《老洛伯》。这种实践彻底颠覆了文言诗歌的表达范式。可以说,实现“形式革新”与“思想解放”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新诗草创期的核心历史任务。

新诗发展期的核心议题在于诗歌规则的系统建构与美学完善。草创期的形式解放虽打破了旧体诗格律桎梏,却也衍生出形式散文化的创作偏向,正如应修人所批判的“像写信,像新闻地随手写上分成行子的几行,就美其名曰诗,我实在怀疑得很”^[6]的现象,这种创作随意性严重消解了诗歌的审美特质。针对这一困境,诗坛掀起了格律化运动:陆志伟提出“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7]的格律观,闻一多则系统建构“诗的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8]的理论体系,其“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理论成为新诗规则探索的核心范式。抗战语境下,新诗发展后期转向“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实践路径。民族存亡的时代危机催生了诗歌功能的现代转型,诗人们“为了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与斗志,广泛开展诗歌大众化运动,开展了诗歌朗诵、街头诗活动”^[1]将艺术表达与救亡图存深度结合。创作实践中,新诗通过双重下沉策略实现社会效能的最大化:一方面知识界主动介入抗战诗歌运动,以通俗化语言创作战地诗篇;另一方面唤醒民间创作力量,号召“广大大众中的‘无名氏’也起来参加这一运

动”^[9]，形成“从全国各地开展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的全民创作格局。这种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新诗突破文学场域的局限，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为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新诗美学的基本维度——从“范畴”到“诗美”

程国君教授的《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基于对中国现代新诗美学实践的深度考辨，构建了极具创新性的学术分析框架——现代新诗的双重美学维度：“美学范畴”与“诗美建构”。在此理论基石上，作者进行了系统化的学术推演：一方面以“崇高”为逻辑原点，建构起中国现代新诗的基本美学范畴体系；另一方面，提炼出“3个阶段7个关键步骤”动态模型，完整勾勒出新诗诗美建构的历史演进轨迹。该研究的学术创新体现为多重突破：其一，突破学界长期以来重“史”轻“论”的研究范式，将新诗从文学史叙述中剥离出来，还原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审美本体性，重新定义了研究的学科维度；其二，在美学层面对新诗史上“雄浑大诗”“审丑”等现象性存在进行体系化整合，使其摆脱传统研究中的碎片化状态，纳入完整的美学范畴谱系；其三，通过对徐志摩、艾青等诗人诗学理论的深度阐释，延展了新诗审美机制的实践路径，为当代新诗美学研究开辟了跨学科的学术生长点。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对冰心、陈敬容等女性诗人的美学特质进行专门考辨，这种性别视角的引入实为新诗美学研究的突破性尝试，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性别研究空白，更通过女性诗歌“柔婉崇高”等独特美学范畴的建构，为新诗美学体系注入了多元维度的理论活力。

首先，程国君教授的《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在学科定位上展现出鲜明的学术自觉。程教授在书中明确界定：“本着不是新诗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诗史》，当属陆耀东先生那样的资格写！），而属于新诗美学探索的史论”^[10]。这一表述既彰显学术谦逊，更清晰划分了研究边界——相较于陆耀东先生三卷本《中国新诗史》以时间轴铺陈历史脉络的撰述方式，程则刻意剥离对“诗史编年”与“史实考据”的过度依赖，转而将研究锚点置于新诗诗美的历时性建构，在美学维度上重绘新诗的精神谱系。在新诗美学源流的考辨中，程打破学界对胡适的惯常认知——尽管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理论主张及其白话实践奠定了新诗的文体基础，但其散文化倾向客观上弱化了诗歌的审美特质。程教授创新性地将白话新诗美学范式的确立归功于郭沫若，提出“‘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演变而来的现代新诗，形成以崇高美、忧郁美为主，优美、丑、怪诞、悲剧性、喜剧性等多元审美形态并存的审美格局”，并强调“郭沫若诗歌最早呈现出新诗独特的美学品格，故而从郭沫若诗歌美学研究开始”^[10]。这一论断不仅重构了新诗美学的发生序列，更以“崇高美”为逻辑起点，建立起区别于文学史叙述的美学阐释框架。

在具体研究架构上，程构建了宏阔的诗人群像谱系：从徐志摩引领的新月诗派、冰心与湖畔诗人的“小诗”写作，到李金发、穆木天的象征主义实践、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探索，再到艾青的七月诗派与冯至、穆旦的西南联大诗群，依循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坐标，系统解构各阶段的美学特质：第一个十年以郭沫若的雄浑壮美开启新诗崇高审美，同时新月派“三美”原则确立优美的形式规范；第二个十年围绕“人之觉醒向生之吟唱”的主题转换，呈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织、崇高与丑怪荒诞并存的多元格局；第三个十年因应时代危机，通过内忧外患的现实书写与民族精神的群体表达，深化了雄豪悲壮的审美意象。这种将美学范畴与历史语境相勾连的研究路径，既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的线性叙事，又通过“崇高——优美——荒诞”的范畴演进，构建起新诗美学的动态生成机制。

其次，程国君教授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以极具穿透力的问题意识切入现代新诗美学研究，通过对“关键词”的深度开掘，揭示了新诗美学中的多重维度。书中诸如第三章的“丑·悲剧性·象征性”、第十章的“纯粹·知性·非崇高”、第十二章的“大化·空灵·圆形之美”等核心概念的遴选与阐释，既彰显其对美学命题的敏锐捕捉，更折射出对新诗本质的深度叩问。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不仅激活了新诗美学的探究张力，更打破学界对“古典”与“现代”美学关系的二元认知，揭示二者间盘根错节的对话机制。

在核心美学范畴的建构中，程教授对“崇高”的阐释尤为亮眼。“崇高”虽源自希伯来文化与基督教传统，承载高洁圣洁的审美指向，但在中国美学语境中，其与古典诗歌的豪迈、雄浑等风格范畴存在深层关联。叶朗在《美学原理》中将“崇高美”纳入美学体系，却未深入探讨其本土化转化路径。程则创新性地指出，中国现代诗歌经历着从“古典和谐（优美）”向“近代崇高”的范式迁移，而“现代文学及其新诗的这一基本美学品格确立的标志，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论，

就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10]。此后，从革命诗歌、艾青的七月派创作到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探索，均延续着这一审美脉络。值得注意的是，程教授强调“崇高”并非西方美学的简单移植，而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结晶。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为例，其“大用外腴，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11]的诗学境界，通过空间的壮阔、力量的奔涌与气势的磅礴，展现出与“崇高”美学共通的民族审美基因。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危亡时刻，“崇高”美学的勃兴既是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契合时代启蒙需求的必然选择——当家国蒙难、士气低迷时，“崇高”不仅承载着明确的精神指向，其蕴含的现代性意识更成为唤醒国民的美学号角。由此可见，古典“雄浑”与现代“崇高”在诗歌创作中的嬗变，本质上是美学传统在时代浪潮中的赓续与新生。

程国君教授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对“丑”与现代主义美学实践的阐释，揭示了中国现代新诗美学体系的多元维度。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重要范畴，“丑”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它并非对传统“崇高”与“优美”范式的简单颠覆，而是通过谐谑、荒诞、颓废等个体化抒情策略，构建起与传统美学既对抗又对话的张力关系。这种美学实践的现代性特质，首先体现为对现实的碎片化书写与颓废情调的审美转化。当早期白话诗因“作诗如作文”的理念陷入散文化危机时，李金发、穆木天等象征派诗人以“弃妇”“半死的月”等病态意象，将波德莱尔式的“审丑”传统植入中国诗坛。程指出，这一时期诗歌“主要审美形态是丑、悲剧性以及审美表现层面的象征性、隐喻性等等”^[10]。这种突破并非否定崇高，而是“离开或牺牲个人的假大空的崇高”^[10]，既解构了英雄叙事，又在平凡中建构起新的审美维度。与郭沫若的狂飙式崇高、艾青的土地厚重感不同，现代派诗人的“审丑”实践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伦理：“它们不是‘诅咒的歌’，它们不偏激，倒是相当中庸，是以美的眼光来诅咒的，它们诅咒，但有审美距离，是以美的眼光来看丑、恶、感伤、颓废等‘不愉快的现象’”^[10]。这种中性姿态打破了传统审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典型如闻一多《死水》以华丽辞藻描绘腐臭景象，通过“翡翠似的白沫”“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等悖论式意象，将现实的丑恶转化为极具张力的审美对象。程教授的研究价值在于：他将“丑”从单纯的艺术手法提升至美学范畴高度，通过对李金发、冯至等诗人的文本细读，揭示出“审丑”实践背后的现代性焦虑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为我们理解新诗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新诗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3. 新诗美学的深化与整合——程著的实践路径与学术启示

程国君教授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构建的诗美理论体系，既立足理论建构的高度，又深植文本分析的沃土。其个案研究将抽象理论与具体诗学实践有机融合，通过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聚焦代表性诗人的美学特质，二是系统梳理诗潮诗派的艺术探索。这种双重研究范式不仅丰富了新诗美学的理论肌理，更通过可操作的评价路径，赋予理论以实践生命力。

首先，程教授以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穆旦、冯至八位诗人为研究坐标，通过文本细读揭示新诗美学的演进轨迹。他指出：“对于现代诗人的诗歌艺术美探索实践作较为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分析现代诗歌一些经典诗作的诗美创作实践，就可以初步勾勒新诗诗美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10]。这一研究路径催生出多重美学发现：从新月派“三美原则”到现代派“知性美”，从艾青的“散文美”到穆旦的“张力美”，构建起多元共生的美学谱系。具体来说，郭沫若以《凤凰涅槃》《天狗》等作品确立新诗崇高美学的基石，其“主情论”主张“真诗”主张：“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st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声地颤动，灵地叫喊，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12]，将五四浪漫主义推向高潮，开启白话新诗的美学探索；新月诗派通过节奏革新与语言重构，反驳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散文化倾向。程则特别指出，他们“吸纳旧诗词和古典语言中富有生命力的语汇使新诗语言‘繁复’起来，使初期新诗克服了那份‘大白话’的‘寒伧’，让新诗重新具有了典雅的风采”^[10]，为新诗美学的本土化提供范式；艾青的“散文美”实践打破自由体、格律诗、民歌体的三足鼎立，以奔放的个性化表达激活五四精神，为文学转型注入新的美学可能；现代派诗人则开创“诗歌思维”，在戴望舒的朦胧隐喻、卞之琳的哲学静观中，实现情感表达与知性思考的融合，拓展了新诗的美学维度。

其次，程的另一重大创新在于对女性诗歌美学的系统发掘。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林徽因、

冰心、方令儒等女性诗人的创作常被男性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学界长期存在结构性忽视。程教授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此前已通过《“你的想法更美些”——论〈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论台湾女性散文的诗学建构》《女性生存的寓言和程序规范的书写——廖辉英小说创作论》《论曹禺对女性命运的沉思与冥想》等成果展现性别视角的洞察力,此次在《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中,他进一步将女性诗人群体纳入核心研究视野,聚焦于林徽因、冰心、方令儒、汪静之等女性诗人的创作实践。这些女性诗人在新诗创作中展现出的独特美学特质,不仅为新诗诗美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整体新诗美学的多样性构建提供了重要补充。她们作品中对个体生命的灵动体悟与敬畏之情的表达,与新诗美学体系中以“崇高美”“雄浑”为主的宏大叙事形成了有机互补,共同勾勒出新诗美学的完整图景。这种研究突破具有双重学术价值:一方面填补了女性诗歌美学研究的空白,将被历史湮没的创作实绩重新纳入诗学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性别视角的引入,打破了新诗美学单一的宏大叙事传统,揭示出“崇高”与“柔婉”“雄浑”与“细腻”的对话关系。

程国君教授的研究既以“美学范畴”建构理论大厦,又以“诗美艺术”夯实文本根基,通过经典诗人的个案解剖与性别视角的创新介入,使新诗美学研究摆脱了“史论分离”的困境,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批评的双向互动中,开辟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新境界。

4. 结语

综上所述,一部兼具思想厚度与学术深度的著作,必然植根于作者深厚的知识积淀与长期的学术耕耘。程国君教授在诗歌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其学术生涯中涌现出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诗学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他将研究视域拓展至延安革命家的旧体诗词创作,其论文《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及史诗价值》不仅荣获《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度“好文章”称号,更标志着其学术探索从现代新诗向传统诗词的跨文体突破。从新诗美学范畴的体系建构到延安旧体诗词的诗史价值重估,程教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的范式跨越。这一学术转向不仅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的成熟演进,更折射出新文学理论与古典诗学的交融创新。他对现代新诗的艺术勘探,为百年新诗研究前半段的学理建构奠定了范畴基础;而对延安诗词的研究,则在前期成果之上,深入考察古典诗歌美学与西方现代诗学对中国现代表达的双重塑造——既敏锐发掘其中的民族文化基因,又精准把握其蕴含的现代性品格。程国君教授的研究正在打破现代诗体间的美学壁垒:通过将新诗的“崇高美”建构与延安诗词的“革命抒情”传统相贯通,推动现代诗美艺术的体系化整合。这种跨时代、跨文体的研究路径,既展现出学者纵贯古今的学术视野,更通过对“民族元素”与“现代品格”的辩证把握,为中国现代诗歌美学提供了兼具历史纵深感与理论创新性的研究范式。其学术实践不仅深化了对诗歌审美机制的理论探索,更为百年新诗美学范式的确立提供了关键的学理支撑,在现当代诗歌研究领域开辟出极具启示性的学术新维度。

参考文献:

- [1] 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440.
- [2] 郑振铎.文学论争集[M].第2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46:63.
- [3] 王运熙.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50.
- [4] 叶圣陶.骸骨的迷恋[N].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9号,1921年11月2日.
- [5]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 3[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93-194.
- [6] 应修人,楼适夷,赵兴茂.修人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254.
- [7] 陆志伟.渡河[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8.
- [8] 闻一多.诗的格律[N].《晨报·诗镌副刊》第七号,1926年5月.
- [9] 《街头诗运动宣言》[N].《新中华报》1938年8月10日.
- [10] 程国君.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2.
- [11] (唐)司空图;罗仲鼎注,蔡乃中注.二十四诗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

[1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第 1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3.

(栏目主编:侯本塔 编辑:佟彤 校对:吴宗译)